

Rothbard, M. N. (1989). The hermeneutical invasion of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3(1), 45-59.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哲学和经济学的诠释学入侵*

穆瑞·N. 罗斯巴德 (Murray N. Rothbard)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侵入了其他知识学科，并以可疑的“科学”之名，采用过于简单化的假设，以便对他们知之甚少的领域做出全面而具有挑衅性的结论。这是知识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的现代形式。这种经济帝国主义的偏见几乎总是定量的和隐含地边沁主义的，其中诗歌和图钉被简化为一个层次，这充分证明了奥斯卡·王尔德关于愤世嫉俗者的讽刺，即他们【经济学家们】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这种经济帝国主义的结果在性、家庭和教育领域尤其可笑。

那么，并不是一位边沁主义者的笔者，为什么现在要冒昧地处理一个像诠释学 (hermeneutics) 一样神秘、深奥、形而上学，并且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领域呢？在这里，我的辩护始终是自卫的正当辩护。一个又一个的学科，从文学到政治理论到哲学再到历史，都被一群傲慢的诠释学家入侵，现在甚至连经济学也受到了攻击。因此，本文具有反击的性质。

首先，诠释学的字典定义是解释圣经的古老学科。实际上，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或 30 年代，诠释学都仅限于神学家和宗教部门。但是，随着现代诠释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的难以理解的德国学说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海德格尔的去世，诠释学运动领袖的宗座继承权落在了他的学生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身上，他现在仍然披着这件斗篷。

近几十年来，诠释学运动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始于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批评中的“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 运动。以法国理论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保罗·里科 (Paul Ricoeur) 和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为首的西半球解构主义由耶鲁大学强大的英语系领导，并由此蔓延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大部分英语文学系。解构主义和诠释学的基本信息可以不同地概括为虚无主义 (nihilism)、相对主义 (relativism) 和唯我论 (solipsism)。也就是说，要么不存在客观真理，要么即使存在，我们也永远无法发现它。每个人都受制于自己的主观观点、感受、历史等等，不存在发现客观真理的方法。在文学中，文学批评的最基本程序 (即试图弄清楚某个作者的意思) 变得不可能。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同样变得无望；此外，不仅没有读者能理解作者的意思，甚至作者也不知道或不理解他自己要说什么，因此每个特定的个体都如此支离破碎、困惑以及受某因素驱使。那么，既然不可能弄清楚莎士比

* 本文改编自 1987 年 4 月在波兰克拉科夫由伦敦学术和文化资源基金和克拉科夫雅格隆大学哲学研究所举办的哲学与社会科学近期趋势会议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亚、康拉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马基雅维利的意思，那么阅读或写作文学或哲学批评的意义何在？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解构主义者和其他诠释学家当然无法回答。根据他们自己公开的声明，解构主义者不可能理解文学文本，或者，例如，伽达默尔不可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尽管他已经写了很多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东西。正如英国哲学家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在他对诠释学的精彩而诙谐的批评中所指出的那样，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或他的作品没有任何话要说，他被简化为报告他自己的主观沉思——一种关于“亚里士多德对我意味着什么”的长篇大论。”¹撇开伽达默尔能否知道亚里士多德对他意味着什么的诠释学问题，我们将这个问题推后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为什么除了伽达默尔之外世界上任何人——也许还除了他的母亲或妻子——都对亚里士多德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呢？甚至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即我们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感兴趣），无论如何，诠释学原理也会阻止我们理解伽达默尔的答案。

解构和诠释学显然在许多层面上都在自我反驳。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任何文本的含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去理解或认真对待那些积极宣称自己不可理解的作者的作品或学说呢？

不可理解性

事实上，关于诠释学家的一个关键点是，对他们来说，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悲哀地告诉我的：“我已经阅读了手上的关于诠释学的所有东西，但我对它的了解并不比我刚开始时的了解更多。”即使在哲学界，一个并不完全以其光彩或清晰而闻名的学界，诠释学家的一大最显著的品质也是他们可怕和无比难以理解的风格。在名副其实的俚俗语堆里，充斥着令人昏沉和毫无意义的散文，堆满了行话的钟乳石和石笋。诠释学家似乎无法写出一句清晰的英语——事实上是一句清晰的德语句。诠释学的批评者——例如乔纳森·巴恩斯或大卫·戈登²——可以理解地转向了讽刺，陈述或引用诠释学小册子，然后将它们“翻译”成简单的英语，在这里它们总是透露出平庸或愚蠢。

起初，我认为这些德国诠释学家只是被他们的英文译者翻译差了。但我的德国朋友们向我保证，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在原文中同样难以理解。事实上，在最近翻译的一篇文章中，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一位通常不擅长流露机智的哲学家——嘲笑了海德格尔的语言。在谈到海德格尔的杰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时，沃格林将完全哲学词典式的词汇的无意义重复称为“在场者的在场”（*Anwesen des Ans wesenden*），“事物的事物”（*Dingen des Dings*），“虚无的虚无”（*Nichten des Nichts*），最后是“指点

¹ Jonathan Barnes, “A Kind of Integrity: Review of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Apprenticeship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以及 Gadamer, *The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London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6, 1986), pp. 12–13.

² Barnes, “A Kind of Integrity”; 以及 David Gordon, “Hermeneutics versus Austrian Economic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6).

工具的指点符号”（*zeigenden Zeichen des Zeigzeugs*），沃格林说，所有这些都是设计出来的，是为了让读者“进入一种语言谵妄的现实退缩状态”。³

关于伽达默尔和诠释学家，乔纳森·巴恩斯写道：

那么，诠释学哲学的特征是什么？它的敌人会用**空虚的、乏味的、恍惚的、模糊的、修辞的**等形容词进行猛烈攻击。伽达默尔本人讲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在一场关于加耶当（Cajetan）的研讨会结束时，海德格尔曾提出一个问题，让他的忠实听众大吃一惊：“什么是存在？”“我们坐在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荒谬性目瞪口呆。”诠释学的敌人也认为这很正确：这个问题完全荒谬。但是伽达默尔对荒谬只有一种微弱的感觉，而他自己的读者应该像他曾经——但可惜，只是曾经——对海德格尔的反应一样作出反应。

巴恩斯接着说，伽达默尔承认“他的想法有时不够清晰”。他进一步引用伽达默尔的话：

当然，我有时会在【我的学生的】头脑中说话并给我的思路带来太多复杂性。甚至早些时候，我的朋友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科学测量方法，即“Gad”，它指定了一种解决不必要的复杂化因素的方法。

巴恩斯补充道：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这个自我祝贺的小故事，伽达默尔对年轻时的自己说：“尽管我的头衔是博士，但我还是一个 22 岁的男孩，思想相当模糊，仍然不知道什么正在发生。”

巴恩斯补充道：“这个男孩长大了吗？”⁴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引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爵士对 G.W.F. 黑格尔（G.W.F. Hegel）的评论，后者和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一起被认为至少是诠释学的曾祖父。波普尔用他对其哲学敌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军团的强烈蔑视，弥补了他所缺乏的讽刺天赋。在谴责黑格尔的“夸张的胡言乱语”和“愚蠢的幻想”之后，波普尔显然津津乐道地引用了他同时代的叔本华对黑格尔的攻击：

一个头脑扁平、平淡无奇、令人作呕、知之甚少的江湖骗子，在乱写乱画和胡说八道方面达到了大胆的顶峰。这种胡说八道被唯利是图的追随者大声宣扬为不朽的智慧，并被所有愚蠢的人欣然接受，他们因此加入了前所未有的完美的赞美合唱。⁵

³ Eric Voegelin, “The German University and the Order of German Society: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Nazi Era,” *Intercollegiate Review* 20 (Spring/Summer 1985): 11.

⁴ Barnes, “A Kind of Integrity,” p. 13.

⁵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4th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2, p. 33.

为什么神秘的废话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赞誉和影响？除了注意到它的建立是为了普鲁士国家的利益之外，波普尔还提供了以下解释：

出于某种原因，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家们也一直保持着某种魔术师的氛围。哲学被认为是一种奇怪而深奥的东西，涉及宗教所涉及的那些奥秘，但不是以一种可以“向婴儿或普通人揭示”的方式；它被认为太深奥了，它是知识分子、博学之人和智者的宗教和神学。⁶

对于诠释学的不可理解性的最后引述，让我们转向 H.L. 门肯（H.L. Mencken）对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另一位早期的原初诠释学家和经济法思想的制度主义反对者——的诙谐和毁灭性的破坏。在一篇将凡勃伦难以理解的散文“翻译”成英文的文章中，门肯写道，凡勃伦的思想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是它们令人震惊的宏大和洛可可式的陈述，这位有天赋的校长的散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乏味和浮夸，他以一种庄严而英勇的方式去言之无物的空前天赋……

我敢说，马克思早在他之前就已经说了很多，而马克思忽略的内容已经被他的继承人和受让人一遍又一遍地说过。但是，在这方面，马克思是在一个技术障碍下工作的；他用德语写作，这是一种他真正理解的语言。凡勃伦教授没有让自己陷入这种不利境地。我相信，虽然他出生在这些国家，并且终生居住在这里，但他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也许没费吹灰之力，即用某种超凡脱俗的外语——比如斯瓦希里语、苏美尔语或古保加利亚语——思考，然后痛苦地把他的想法变成了一种丰富而不确定但从书本上学来的英语。结果是一种影响高级理智中心的风格，就像不断滚动的地铁快车一样。第二个结果是一种不知所措的感官麻木，就像之前的一些神话般的超凡脱俗的奇迹。第三个结果，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就是这位教授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名声。⁷

集体主义

事实上，马克思被诠释学家誉为这场运动的祖父之一。例如，1985 年，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西方政治科学协会年会上，几乎所有政治理论论文都是诠释学论文。一个典型的标题是《作为文本的政治生活：马克思、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福柯的诠释学和解释》。（自由地替换诸如利科和德里达之类的名字，偶尔也屈从于哈贝马斯。）

我不认为卡尔·马克思被视为一大诠释学家是偶然的。本世纪，马克思主义、其自称“科学真理”、其理论命题以及经验断言和预测都经历了一系列毁

⁶ 同上，p. 30.

⁷ H.L. Mencken, “Professor Veblen,” *A Mencken Chrestomath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p. 270.

灭性的挫折。如果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被迷惑了，那么马克思主义信徒还能依靠什么？在我看来，诠释学非常适合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说法——称之为“晚期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衰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的，也不是科学，但那又怎样？诠释学家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客观真实的，因此所有观点和主张都是主观的，与每个人的突发奇想和感受有关。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渴望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有效呢？以诠释学的方式，这些渴望是无法反驳的。既然不存在客观现实，又因为现实是由每个人的主观解释创造出来的，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个人的非理性的趣味。那么，如果诠释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丑陋和不可爱，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美丽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尝试将个人审美偏好付诸行动呢？如果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是美好的，尤其是因为没有经济规律或政治哲学真理可以在他们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有什么能阻止他们？

除了少数当代经济学家（稍后将进一步讨论）之外，过去和现在的每一位诠释学家都是公认的集体主义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有时甚至是根据权力的现实从一种集体主义转向另一种集体主义。马克思、凡勃伦、施莫勒和德国历史学派是众所周知的。至于现代诠释学家，纳粹政权一建立起来，海德格尔就十分轻易地成为了狂热的纳粹分子。而无论是适应纳粹政权（他以对第三帝国只有“松散的同情”而闻名）还是苏联在东德的占领（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那里他因为“完全执行俄罗斯文化当局的指令，甚至违背了我自己的信念”，而赢得了“他们的特别尊重”），伽达默尔都没有丝毫难度。⁸

“开放”与保持“对话”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般诠释学主题的两种变体。一方面是直言不讳的相对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他们以一种前后不一的绝对主义热情，断言不存在真理。这符合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臭名昭著的格言，即“怎么样都行”（anything goes）。任何事物，无论是天文学还是占星术，都具有同等有效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同等无效性。“怎么样都行”学说的一个可能优点是，至少每个人都可以放弃科学或哲学事业，去钓鱼或买醉。然而，主流诠释学家拒绝了这种优点，因为它会结束他们心爱的无休止的“对话”。简而言之，主流诠释学家不喜欢“怎么样都行”的格言，因为他们不是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认识论的害虫。他们坚持认为，即使不可能达到客观真理，甚至无法理解其他理论家或科学家，我们仍然有深刻的道德义务进行无休止的讨论，或者他们所说的“对话”，以尝试得出某种稍纵即逝的准真理（quasi truth）。对诠释学家而言，真理是主观相对主义的流沙，它基于参与无休止对话的主观头脑的短暂“共识”。但最糟糕的是，诠释学家断言，无论是通过经验观察还是逻辑推理，都没有客观的方法来为这种共识提供任何标准。由于没有合理的协议标准，任何共识都必然是任意的，基于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一个人突发奇想、一个或多个谈话者的魅力，或者可能是纯粹的权力和恐吓。由于没有标准，因此共识会发生即时和快速的变化，这取决于参与者的任意心态，当然，也取决于构成永恒对话的人的变化。

⁸ Barnes, “A Kind of Integrity,” p. 12.

渴望找到某种共识标准的另一群诠释学经济学家，抓住了已故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也许是徒劳地冒用了他的名字——的格式塔式（Gestalt-like）短语。他们称这个标准为“啊哈！原则”，意思是命题的真实性是基于这个提议可能会在某人的心中激起“啊哈！”的感叹。正如唐·拉沃伊（Don Lavoie）和杰克·海伊（Jack High）所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好的解释，当它诱导我们说啊哈，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好的解释。”⁹不知何故，我不认为这个对真理来说，甚至对共识来说的标准是有说服力的。例如，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发现，与无法写出清晰句子或表达清晰思想的人进行无休止且必然徒劳的对话的前景，与萨特的《禁闭》（*No Exit*）在道德上等同。此外，我有一种预感，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让这些人在头脑中了解客观现实，那将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或者至少关上他们对话的大门——相比诠释学家们自己的模糊命题，这会引发更多热烈的“啊哈！”。

诠释学家宣称的首要道德责任是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话**。由于这项义务是隐含的，它从未被公开地辩护，因此我们没有被告知为什么我们的道德义务是维持一个产生如此微不足道和短暂结果的过程。为了与这种所谓的美德保持一致，诠释学家们热烈而教条地反对“教条主义”，他们宣称对对话中的每个人保持无休止的“开放”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伽达默尔宣称，诠释学哲学的最高原则是“在对话中保持开放”，这意味着总是“预先”认识到“对话伙伴的立场的可能的正确性，甚至是优越性”。但是，正如巴恩斯所指出的，对自己的立场持谦虚的怀疑态度是一回事；拒绝将**任何其他**立场视为错误的或有害的是另一回事。巴恩斯指出，谦虚的怀疑论者

认识到他自己可能总是错的。伽达默尔的“开放”哲学家允许他的对手可能总是对的。一个谦虚的怀疑论者可能……确实——以其谦虚的方式——将哲学史视为一场对抗永远强大的谬误和虚假力量的不停歇的运动，以经常的失败和偶尔的胜利为标志。……对于某些对手，他不会“开放的”：他会很确定他们是错的。¹⁰

美国最重要的诠释学哲学家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他在其名著《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中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保持对话”的首要重要性。亨利·维奇（Henry Veatch）在他对罗蒂的精彩批评中指出，对于我们对话主义者如何才能知道哪些理想或“文化立场”

（用罗蒂的话说）比其他的更好这个关键问题，“罗蒂只能回答，当然，对于这些情况，不可能存在任何**知识**。”因此，如果不存在知识，并且因此也不存在达到立场的客观标准，我们必须得出结论，用维奇的话来说，“尽管亚里士多德很可能教导说‘哲学始于困惑（wonder）’，……现代哲学只能终于完全的概念上的或智识上的纵容。”¹¹简而言之，我们以费耶阿本德式的“怎么样

⁹ Don Lavoie and Jack High,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osts of Formalis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 14.

¹⁰ Barnes, “A Kind of Integrity,” p. 13. 关于对“开放”理念的胜利的批判，参见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¹¹ Henry Veatch, “D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Has Rorty Made It the Denouement of Contemporary Analytical Philosophy?” *Review of Metaphysics* 39 (December 1985): 313–14, 316.

都行”作为结尾，或者，用亚瑟·丹托（Arthur Danto）在他对尼采的总结中令人钦佩的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¹²或者，换句话，完全的“开放性”。

但是，如果一切都是开放的，并且没有标准可以指导对话主义者得出任何结论，那么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按照维奇的做法，这些决定将由那些拥有更高权力意志（Will-to-Power）的人做出。因此，领先的诠释学家发现自己在应对国家权力的严格要求上灵活且“开放”，这并非巧合。毕竟，如果斯大林、希特勒或波尔布特进入“对话”圈子，他们不能被立即拒绝，因为他们也可能提供更好的共识方式。如果一切都没有错，一切都是开放的，我们还能期待什么？谁知道呢，在马库斯式的“压制性宽容”的讽刺爆发中，即使是这些统治者也可能决定在普遍的古拉格中保持某种奥威尔式的“对话”。

在所有关于开放的喋喋不休中，我想起了玛乔丽·霍普·尼科尔森（Marjorie Hope Nicholson）教授 1942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演讲。在对开放思想概念的批评中，她警告说：“不要让你的思想过于开放，以至于进入它的一切都会失败。”

普遍开放的诠释学要求还有另一个自私的方面。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任何立场，任何教义——可以被直接斥责为错误的或有害的或斥责为无聊的胡说八道，那么他们，即我们的诠释学家们，也必须避免这种粗鲁的斥责。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对话意味着这些人必须永远被包括在内。这也许是最无情的伤害。

此外，如果人们阅读诠释学家的东西，他们就会很清楚，通常没有一个句子跟随任何其他句子。换句话说，不仅风格可恶，而且没有推理支持结论。由于诠释学家不认为逻辑或推理有效，因此这一过程并不奇怪。取而代之的是，诠释学家用几十本来进行推理，这些书被广泛引用，几乎在每一段中都被引用了。为了支持他们的陈述，诠释学家将反复列出每本可能相关或沾边的书籍。简而言之，他们唯一的论据来自权威，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谬误，他们似乎已经成功地复活了。因为事实上，如果没有现实的真理，如果为了逻辑或经验，我们必须用各种谈话者的主观心血来潮、感觉或权力游戏的短暂共识来代替，那么除了召集尽可能多的对话主义者来作为你所谓的权威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¹³

凭借他们特殊的方法，诠释学家因此能够将所有对自己的攻击，无论多么有洞察力或穿透力，都视为“不学术”。这种崇高的反驳源于他们对学术的独特定义，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冗长而晦涩的措辞被一大堆广泛引用的大量不相关的书籍和文章所包围。

那么，为什么那些杰出的诠释学批评家没有在他们的对手的地盘上玩游戏，费力地阅读废话的高山海洋，一个要点接一个要点，一篇期刊论文接一篇

¹² Arthur C. Danto, *Nietzsche as Philosop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2; 引自 Veatch, “Deconstruction,” p. 312.

¹³ 这一点我要感谢乔治·梅森大学人文研究所的谢尔顿·里奇曼（Sheldon Richman）。

期刊论文，耐心地引用和驳斥诠释学？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回答它。事实上，我们已经向一些批评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立即发自内心地回应说，他们不打算将余生奉献给费力地阅读这种胡言乱语的瘴气。而且，这样做，按照诠释学家自己的规则行事，将给予他们太多的荣誉。这会错误地暗示他们确实是我们对话中有价值的参与者。相反，他们应得的是蔑视和摒弃。不幸的是，他们并不经常接受这样的待遇——在这个世界里，太多知识分子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去发现自命不凡的哗众取宠的内在能力。¹⁴

诠释经济学

经济学家喜欢将他们的学科视为社会科学中“最硬的”学科，因此诠释学——尽管已经征服了文学领域并在哲学、政治思想和历史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尚未在经济学中取得什么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经济学学科十多年来一直处于方法论的混乱状态，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少数方法论（现在也包括诠释学在内）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当然，在经济学界，战壕中的从业者只是松散地反映了象牙塔上层的少数方法论思考，或者的确对其没有任何兴趣。但这些看似遥远的哲学思考确实对学科的指导理论和方向产生了重要的长期影响。大约二十年来，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理所应当的名著《经济科学的本质与意义》（*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是学界的指导性方法论著作，呈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行动学方法的淡化版本。罗宾斯曾在米塞斯著名的维也纳私人研讨班上学习，他的第一版（1932年）强调经济学是一门演绎学科，基于人的行动之普遍事实的逻辑含义（例如，人试图通过使用必然稀缺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在罗宾斯更广为人知的第二版（1935年）中，米塞斯的影响被进一步淡化了一点，再加上巴掌大¹⁵的新古典主义形式主义的暗示，这种形式主义将在二战期间冲击学界。¹⁶战后，旧经济学被新兴的形式主义和数学新古典综合（瓦尔拉斯方程涵盖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几何关注宏观）所淹没。

195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名文章《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帮助和教唆新的新古典综合征服经济学，很快大获全胜，毫不客气地将罗宾斯的《本质与意义》扔进了

¹⁴ 在一篇诙谐而敏锐的文章中，著名的耶鲁大学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称这种现象为“胡说八道”，他声称与彻头彻尾的谎言相比，它是真理的更大敌人，因为说谎者承认他违反了真理，而胡说八道不承认。法兰克福写道：

当代胡说八道的扩散也有更深层次的根源，各种形式的怀疑主义否认我们可以可靠地接近客观现实，因此拒绝了解事物真实情况的可能性。这些“反现实主义”学说破坏了人们对无私努力确定什么是真假的价值的信心，甚至破坏了客观调查概念的可理解性。

参见 Harry Frankfurt, “On Bullshit,” *Raritan* 6 (Fall 1986): 99–100.

¹⁵ 这个有点奇怪的说法出自《圣经·列王纪上》，18: 44。——译者注

¹⁶ Lione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32] 1935).

历史的垃圾箱。¹⁷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弗里德曼的文章安全且没有受到挑战，实际上仍然是现代经济学官方方法论的唯一书面描述。

应该指出的是，正如凯恩斯革命的胜利和各种经济学流派的许多其他征服一样，弗里德曼的文章并没有以我们可以称之为辉格科学史理论的模式——通过耐心地驳斥相互竞争的或流行的学说——赢得经济学家的心。就像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前占主导地位的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一样，罗宾斯的书没有被驳倒；它只是被忽略了。在这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关于接替范式的理论在社会学或经济思想过程上是准确的，也是可悲的，因为它可能是一门科学发展的处方。在哲学或社会科学中，思想学派常常因一时兴起或潮流而相互接替，就像一种风格的女士裙摆接替了另一种风格一样。当然，在经济学和其他关于人的行动的科学中，更险恶的力量，如政治和权力驱动，往往为自己故意歪曲潮流的一时兴起。

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做的是将主导哲学十多年的学说引入经济学，即逻辑实证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里德曼在其对美国哲学界的铁腕控制已经过了顶峰的时候，才引进了逻辑实证主义。三十年来，我们不得不忍受自鸣得意的坚持，即认为对假设的演绎进行实证检验至关重要，以此作为计量经济学模型和预测盛行的理由，以及理论基于公认的错误和极其不切实际的假设的普遍借口。因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显然建立在荒谬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例如完全的知识；没有利润、没有损失、没有不确定性的一般均衡的持续存在；以及人的行动被微积分的使用——假设我们的感知和选择是由无限小的微小变化构成——所涵盖。

简而言之，从米塞斯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数学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强大工具都建立在错误假设甚至荒谬假设的危险流沙之上。几十年来，奥地利学派对虚假和不现实的指控，如果有被注意到的话，几十年来一直被傲慢地驳斥——通过指向弗里德曼的文章，并声称只要理论“预测”正确，假设和前提的虚假并不重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计量经济学会在成立之初便在其徽章上印上了“科学就是预测”的座右铭，这就是弗里德曼为新古典理论辩护的精髓。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回答说，人的行动的学科不像物理科学。在人的事务中，不存在可以控制变量和检验理论的实验室，而（与物理科学不同）在一个有意识、意志自由和接受价值和目标的自由的世界里，并不存在定量常数然后改变它们。这些奥地利学派的论点被新古典主义者驳斥为只是在到达人文科学方面造成了更大的困难，而不是在提供一种不同种类的麻烦。

然而，新古典综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失去理解或预测经济状况的能力。1973-74 年的收缩第一次出现剧烈的通胀期衰退，结束了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主义分支长达 35 年的傲慢和无可置疑的霸权时期。因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建立在通胀期衰退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关键假设之上。那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脱颖而出，但在从里根时代开始到现在做出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错误

¹⁷ 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预测之后，货币主义现在已经栽了跟头。但是，靠预言而活的人，注定会因预言而死。

除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这些失败之外，计量经济学预测的失误和错误也变得太臭名昭著以至于不容忽视，一个富裕而极度自大的学界——使用越来越快的计算机模型——似乎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预测，哪怕是预测不久的将来。即使是政府，尽管得到了顶级新古典经济学家和预测家的孜孜不倦的关注和帮助，在预测**它们自己的**支出方面似乎也有很大的困难，更不用说它们自己的收入了，更不必说其他任何人的收入或支出了。

在这些失败中，瓦尔拉斯主义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形式主义遭到削弱，有时是被幻想破灭的领军人物从这种统治范式的内部削弱。

由于这些问题和失败，过去 10 年或 15 年在经济学领域出现了经典的库恩式“危机情况”。随着实证主义新古典正统观念开始瓦解，竞争范式出现了。哈耶克在 1974 年获得诺贝尔奖也引发了奥地利学派或米塞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许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任教。最近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五六个奥地利学派的研究生项目或中心。

当然，在危机情况下，在认识论和实质性多样性的新氛围中，坏事会与好事发生冲突。没有人保证如果一百朵花盛开，它们都会过得很好。在左边，制度主义的非理论已经卷土重来，受到“后凯恩斯主义者”（受琼·罗宾逊的启发）和“人文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竞争，后者用严格的劳动价值论取代了对“去中心化”和保护所有动植物生命形式的模糊坚持。

这让我们回到了诠释学。因为在这种气氛中，即使是诠释学的黑道也会在阳光下争夺它的日子。美国最杰出的诠释学经济学家可能是唐纳德·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¹⁸，他称自己的观点为“修辞学”，并以修辞学和永恒的诠释学对话之名攻击真理。¹⁹不幸的是，麦克洛斯基遵循了修辞狂放的现代道路，脱离了真理的坚定锚，忽视了作为说服人们正确和真实命题的最有效方式的“高尚修辞”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来说，只有“卑鄙”的言辞才脱离了真正的原则。²⁰麦克洛斯基现在正在爱荷华大学组织一个修辞学研究中心，该中心将组织多个不同学科的修辞学书籍。

尽管我对诠释学表示遗憾，但我对麦克洛斯基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他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在弗里德曼-斯蒂格勒芝加哥学派的实证主义队伍中担任了多年的教官和干部领袖。麦克洛斯基正在对这些东西做出反应：几十年来傲慢的实

¹⁸ 后来变性为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译者注

¹⁹ Donald N. McCloskey,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如需对麦克洛斯基的著作进行全面的米塞斯主义批判，请参阅书评文章 Hans-Hermann Hoppe, “In Defense of Extreme Rationalism: Thoughts on Donald McCloskey’s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3 (1989): 179–214.

²⁰ 比照 Richard M. Weaver, *The Ethics of Rhetor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以及 Larry Arnhart, *Aristotle on Political Reasoning: A Commentary on “The Rhetoric”*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

证主义霸权、从未真正发生过的所谓经济理论的“测试”，以及实证主义者的崇高声明，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们非常清楚你的意思但不同意它，他们用他们狭隘的意义标准来驳回你的论点。通过这种方式，实证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在庭外阅读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问题，并将它们交给被鄙视的宗教和文学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诠释学的兴起是那些部门的报复，向实证主义者反驳说，如果“科学”只是定量的和“可检验的”，那么我们将用**真正**毫无意义的东西淹没你。

更难的是为经济学中的主要诠释学家群体——一群聚集在乔治·梅森大学市场过程中心的叛变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前米塞斯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开脱。这个团体的精神领袖唐·拉沃伊（Don Lavoie）达到了这样的顶峰，将他与伟大的伽达默尔交谈的照片印在了他的杂志《市场过程》上。²¹拉沃伊组织了一个解释性经济学学会（**解释**是诠释学的代名词）来传播新的福音，并厚颜无耻地发表了一篇题为《米塞斯和伽达默尔论理论与历史》（Mises and Gadamer on Theory and History）的论文，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建议的，这在道德上等同于我写一篇论文题为《拉沃伊和希特勒论自由的本质》。

必须指出的是，在拉沃伊和他在市场过程中心的同事如此热情地接受它之前，虚无主义已经渗透到当前的奥地利学派思想中。它始于路德维希·M. 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他在20世纪30年代是哈耶克在英国的弟子，在20世纪50年代写了一部称职的奥地利学派著作《资本及其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他突然被英国经济学家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的方法论转变。²²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都在纽约大学任教的拉赫曼参与了一场运动，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带来随机性和放弃理论的祝福。当拉沃伊和他的同事发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时，拉赫曼在1986年乔治·梅森大学解释性经济学学会第一次年会（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也是最后一次年会）上接受了这个新信条。然而，真正的米塞斯主义信条仍然在以下地方蓬勃发展：奥本大学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院和华盛顿特区，及其出版物：《自由市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通讯》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其第一期包括一篇对两位前米塞斯主义者（他们声称在亨利·柏格森的著作中发现了经济学的关键）的准诠释学著作的批评。²³

前米塞斯主义诠释学家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们对数学的恐惧——他们对数学的反应如同对美杜莎头颅的反应——导致他们在反对实证主义和新古典形式主义的斗争中几乎拥抱任何盟友。所以他们发现，你瞧，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诠释学家也几乎不使用数学。但在他们完全接受这条绝望信条，即我的敌人的敌人必然是我的朋友之前，我们的市场过程诠释学家应该被警告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有比数学甚至实证主义更糟糕的事情。其次，除了纳粹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之外，其中之一可能是诠释学。

²¹ *Market Process* 4 (Fall 1986): 16.

²² Ludwig M. Lachmann,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56). 后来，后沙克尔或虚无主义的拉赫曼可见于“From Mises to Shackle: An Essay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Kaleidic Socie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4 (1976).

²³ 因此，参见 Charles W. Baird, “The Economics of Time and Ignorance: A Review,”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 (1987): 189–223.

正如麦克洛斯基教授的历史可以部分减轻他对诠释学的拥护一样，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减轻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罪恶。因为毕竟，虽然他们不愿承认，但实证主义者也不是从奥林匹斯山降临到我们这里来的。他们在旧维也纳长大，发现自己身处日耳曼世界，被黑格尔主义等原初诠释学信条以及甚至在当时就已崭露头角的年轻海德格尔所主宰。在日复一日地阅读和聆听辩证法和原初诠释学之后，在多年来沉浸在他们被告知构成哲学的胡言乱语中之后，他们——包括波普尔和卡尔纳普、赖兴巴赫、石里克等——最终应该猛烈抨击并惊呼整个事情毫无意义，或者他们应该大声疾呼语言的精确和清晰，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像半个世纪后的麦克洛斯基一样，新生的实证主义者会走得太远，把新黑格尔主义的洗澡水和哲学的婴儿一起倒掉，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吗？

在他对诠释学经济学的赞歌的演说中，前米塞斯主义者理查德·埃贝林（Richard Ebeling）宣称：“人喜欢谈论他自己。”²⁴但在反驳中，我指出了美国文化和政治讽刺作家汤姆·莱勒（Tome Lehrer）的圣言。在 20 世纪 60 年代，莱勒指出，“很多人都在抱怨他们‘无法沟通’。”莱勒补充道：“在我看来，如果你无法沟通，你至少能做的就是闭嘴。”唉，这是埃贝林和他的诠释学同事们还没有学会做的事情。

²⁴ Richard M. Ebeling, “Hermeneutics and the Interpretive Element in the Analysis of the Market Process.” Centerr for Market Processes Working Paper. (Fairfax, V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1985), p. 45. 参见 Frankfurt, “On Bullshit,” p. 100.